

从论《兰亭》的真伪到唐太宗的“造星运动”

吴慧平

摘要

种种迹象表明,《兰亭序》的出世、扬名与模榻、殉葬、辗转流传都与贞观时期的唐太宗李世民的精心策划与组织密切相关。据此,本文认为《兰亭》事件是唐太宗为了树立书法领域新偶像,而进行的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造星活动”。这一事件可从以下几个过程展开:一、贞观年间开展广收王羲之真迹的活动,真假不辨,照收不误。二、计赚《兰亭》,产生热门话题。三、将错就错,众人临摹,原本隐藏。四、亲自为王羲之做传,将《兰亭序》一文录入《晋史王羲之传》,弄假成真。五、太宗死后,《兰亭序》原本入葬昭陵,死无对证,留下临本在世,后人无法评说。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精心策划,唐太宗最终将王羲之推向了书法史上的至高地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们。

关键词

李世民;《兰亭》真伪;造星运动

小引

《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书法作品之一,自唐初以来至清末的一千多年里,对书法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代以来的一流书法家或多或少地与它发生了那么一点关系,或临写或传拓。甚至可以极为武断地说,谁要没有接触过《兰亭序》,谁就无法跻身书法名家之列。但是从清末李文田开始,对《兰亭》真伪的怀疑就不断出现,最为著名者当推20世纪60年代的“兰亭论辩”了。论辩由郭沫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光明日报》1965年6月10、11日),从文章和书迹方面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开始,惊世骇俗。郭文一出,高二适在章士钊支持下,在《光明日报》不加修改,《文物》影印发表的情况下,在政治和考古两大重镇,发表了反驳意见。1973年,《兰亭论辩》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十八篇文章。“上篇”十五篇,系与郭沫若观点一致的文章,“下篇”三篇,是与郭文观点对立的文章。此次争论,虽以郭沫若的胜利而告终。但也由此开启了后续的诸多争论话题。

尽管郭沫若的证据基本上没有脱离清末学者李文田的证据范围,但他的一句牢骚——“皇帝过过目,就不会是假?”却足以引人深思!中国历史上指鹿为马、弄假成真之事多矣。王羲之研究专家广州美术学院祁小春教授《文本与记录文献中所见的〈兰亭序〉》一文中也提出了以下几个疑问:1. 为何不见唐以前有人谈论《兰亭序》帖本? 2. 为何也不见唐初有人谈论《兰亭序》? 3. 为何不见正史记载“真迹”? 4. 为何相关记录晚出? 5. 《兰亭记》中所记人物的真实性? 6. 如何看待《兰亭序》记录文献的“史料”价值? 北大文献学博士寇克让先生在《书法没有秘密》一书中也提到了《兰亭序》有八个疑点:第一,篇幅及形式。第二,再久远的历史事件都有蛛丝马迹,而《兰亭序》在隋唐之前没有任何线索,几乎是从天而降。第三,贞观年间“现身”的方式一反常规。第四,谁告的密? 第五,为何许多高

手看不破?第六,为何众人临摹?第七,为何随葬昭陵?第八,为何遭人怀疑?^[2]《兰亭序》本身所引发的诸多质疑与争论,就足以证明其真伪的不确定性。对我们而言,《兰亭序》的真伪之讨论,已不甚重要,重要的是探究事情真相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种种迹象表明,《兰亭序》的出世、扬名与模榻、殉葬、辗转流传都与贞观时期的唐太宗的精心策划与组织密切相关。据此,本文认为《兰亭序》事件是唐太宗为了树立书法领域新偶像,而进行的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造星活动”。我们首先从唐太宗的重修《晋书》开始谈起。

一、现本《兰亭》与早期古籍中引用的《兰亭》文本之差异

《兰亭序》是我国书法史上一颗璀璨的星星,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它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书法、文化乃至精神,但是近代以来现传本的《兰亭序》却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风波,其中一条值得怀疑的线索就是现本《兰亭》与早期古籍中引用的《兰亭》文本并不相同。

《晋书·王羲之传》云:

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3]

现本《兰亭》来自《晋书·王羲之传》,共324字。《晋书》是一部记载两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旧书亦题“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唐太宗撰写了书中《宣帝记》、《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四篇传末的“论”,实际上是由唐代房玄龄、褚遂良等二十一人奉命编撰的,其中监修三人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为李淳风;拟订修史体例为敬播;其他十六人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馥、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怀俨。现本《兰亭》的文本尤其是后面多出的200余字,几乎是从天而降,没有任何线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兰亭序》早期文本的记录,一是《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在《企羡篇》注中刘注引用的《兰亭序》文本如下:

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游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

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4]

第二则是唐初武德年间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

晋王羲之三日兰亭诗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乐，信可乐也。^[5]

将这两例引文相比照，内容大体相似。最早出现的刘孝标注文从“故列序时人”开始，多出49字，是《艺文类聚》与现本《兰亭序》都没有的，我们猜测，唐时的《艺文类聚》应该是参考了刘孝标注，进行了删减。但现本《兰亭序》多出将近200字。而且多出的内容与上文内容互相矛盾，很难解释。一般而言，引文有删减例，但却不应有增加的文字，而且如此之多。虽有学者指出序文原作为草稿，古籍引用的文本有可能有不同的文本，或者是修改过的正式文章，但这并无明确的证据。因此现本《兰亭序》正文出现的前人文献中没有的200余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唐修《晋书·王羲之传》中，就显得极为可疑了。这一问题已成为《兰亭》聚讼的关键点之一。

唐太宗不仅将现本《兰亭》文本录入《晋书》，而且还以帝王之尊，将对王羲之的推崇写进了历史。

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翰，争相夸尚，竞其工拙。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逮乎钟、王以降，略可言焉。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覆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羸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缩秋蛇，卧王濛於纸中，坐徐偃於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斂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6]

以上事件成为了唐太宗的“造星运动”成功的重要标志。他通过贬低六朝时期产生重要影响的王献之来推崇王羲之，并以帝王之尊亲自为王羲之做传，而且把对王羲之的推崇写进了历史，将来历不明的现本《兰亭》文字录入《晋书》。唐太宗认为，王羲之的地位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背后或许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兰亭序》也是如此。事实上，《兰亭序》真的如唐太宗所说的那般“尽善尽美”吗？

二、神龙本《兰亭序》的种种疑点

现本《兰亭序》的笔法不类右军其他书札，已经成为书法界的共识。现存最早的几个临摹本中，旧题虞世南本（张金界奴本）因重裱而大失神采，墨色黯淡；旧题褚遂良本则以临写为主，辅以勾描，且以宋以后才普遍使用的楮皮纸书写，很有可能为宋以后临摹本；神龙本为唐双钩填墨本，虽然“神龙小印”不可信，但仍然是唐以来传承有序的摹本。相较之下，神龙本笔画勾摹清楚，字势生动，而且时有贼毫，用笔俯仰反复，自然生动，历来被认为是最接近原

本的摹本，适合用于分析《兰亭》用笔。

书法作品的时代风格是判断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每一个朝代都有着自特有的笔法与风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格调与品位。与王羲之的其他作品相比较，现本《兰亭》露锋起笔处常常显得不够爽利，缺乏王羲之其他作品里的雄强气势。

从图1可以看出，《兰亭序》选字的起笔显得尖细、柔媚，发笔处与笔画中段行笔处过渡变化不大，衔接十分顺畅，没有《奉橘帖》《丧乱帖》选字那样一拓而下的风气，“百”字首横顺锋入纸后即刻侧锋发力，行笔后再调整为中锋，而“一”、“诸”的“言”旁的横下笔后都没有侧锋发笔的动作，像是很在乎中锋发力的感觉。而这正是隋唐人的笔法与风格。

王羲之书作的起笔即便是在《姨母帖》等早期书作中，用笔技巧不十分丰富的情况下，也是厚实与充满力量感的，像《兰亭序》般轻轻落笔并轻柔地转换笔锋方向的做法，与其他现存王羲之作品的摹本相比也是有明显的差别，并与梁武帝说的王羲之“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7]不合。

除了发笔处外，神龙本《兰亭》的许多笔画的起笔收笔处都有明显的顿笔动作，这明显是隋唐以后的行笔习惯。

图2中《兰亭序》“脩”字的几个竖笔，在收笔处有明显的顿笔，尤其是竖的顿笔使得其已经很接近所谓“鹤膝”的状况了，细看很不协调。“观”字“隹”部左竖及见部的两竖顿笔也很突出，这种状态在现存的王羲之其他作品的摹本中很少见，《丧乱帖》与《平安帖》中的“脩”字面貌各不相同，但都没有这种突然顿笔的状况，有顿笔也是由竖笔上方逐步向下停顿的，而不是突然顿笔成馒头样。

另外，笔画的转折处：王羲之书写的文字尚带古意，这“古意”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笔画转折时的动作和表现出来的姿态。王羲之的笔法中保留了秦汉以来的篆隶书的用笔方法，其中包括在文字笔画转折处使用绞转的笔法书写，得到的是圆转的线条，这种效果与方折是不一样的，王羲之的作品里两者兼有，而《兰亭》里方折的笔画居多。

以上几点正说明现本《兰亭序》与王羲之现存的其他书作面貌不合，至少不太接近，但将之与隋唐人书作比较，它们却有很多共同点。

图3中用以对比的是智永的《真草千字文》，两个“所”字面貌虽然不尽相同，但首横轻柔的下笔却是异曲同工，横笔末端更是都有突出的顿笔；至于“亭”字相似点就更多了。连其中两竖的轻重程度都是一样的，可见《兰亭序》与智永书作的相似度是很高的。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神龙本《兰亭序》这份被认为是最接近《兰亭》原本的摹本，其面貌与王羲之的其他书作摹本有相当的差距，反而与隋唐人的书法面貌相近。这是郭沫若怀疑《兰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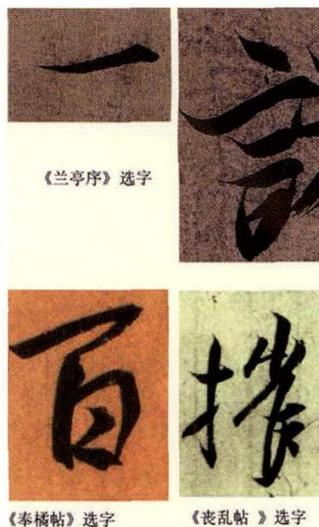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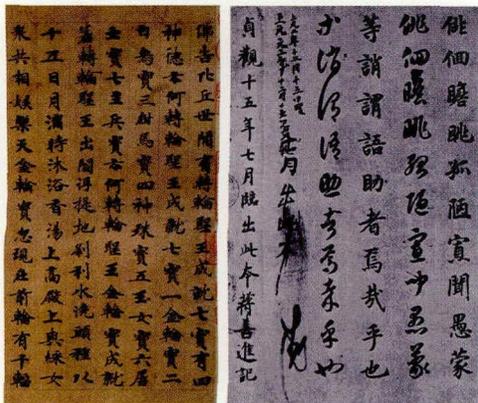
图1 《兰亭序》、《丧乱帖》、《奉橘帖》选字对比图



图2 《兰亭序》、《丧乱帖》、《平安帖》选字对比图



图3 《兰亭序》与《真草千字文》选字



左 / 图4 唐无名氏《转轮圣王经》
右 / 图5 蒋善进摹本《真草千字文》

为智永临写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唐人尤其是唐代僧人的书写技巧很高，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庞大的书家群体，如唐人写经的风格与神龙本《兰亭序》风格极为类似。在那个时期，不光是智永，就是唐初的一般僧人，那些抄经手，也具有相当的书写水平。如图4唐·无名氏书写的《转轮圣王经》。文献中也有诸多记载：

马宗霍《书林藻鉴》释文楚条：“《宣和书谱》：喜做草书，学智永法，摆脱旧习，有自得之趣，在元和间所书千文，落笔轻清，无一点俗气。”杨慎云：“唐五僧善书，刘泾尝做书话，以怀素比玉，光比珠，高闲比金，贯休比玻璃，亚栖比水晶，牟子才云惜泾未见文楚，故未有定。”

释贤首条：杨翻云，贤首国师与新罗羲想上人手帖，字画精妙，视兰亭襖帖序，盖难议其优劣。^[8]

另有敦煌所出贞观十五年（641）蒋善进临本中的行书风格也与《兰亭序》极为相似。我们现在看到的冯承素摹本理论上推断应该是最接近唐太宗购求的《兰亭》真本的。如果这一假设属实，就可以反过来推断，唐太宗购求的《兰亭》真本很值得怀疑，可能是赝品。因为唐初书法崇尚王羲之，僧人的书写水平很高，写出类似现本《兰亭》风格，把带有王羲之的古朴之风的行书改造为隋唐之际的研美之风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贞观时期为何推崇王羲之

对于一个书法家的喜爱，要么是自己非常喜欢，要么是社会上必须以他为榜样。因此对于李世民朝来说，收集包括二王手迹在内的图书文献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而且，王羲之书法的风格也正是太平盛世的统一王朝所需要的。两晋南北朝时，社会混乱，文士常以怪诞荒悖遁世，兼以道释盛行，因此王献之等人的外拓狂放的书风受到追捧，但统一之后的盛世，国家需要温和的不激不厉的文艺风格。时人评“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9]。这种审美趋向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对于个人而言，李世民出身北朝，他的书学来源应当最先来自北方书风，史载其曾向史陵、虞世南、褚遂良学书。《书后品》序：“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处也。’”^[10]关于史陵，我们只知道他“善正书，笔法精妙，不减欧虞”，“亦有高古，伤于疏瘦”^[11]。赵明诚《金石录》收有史陵正书《隋禹庙碑》一石，大业二年（606）五月立在越州。他大概是由隋入唐的人。从“疏瘦”可以大致猜测其书风大概近于欧阳询的瘦硬面貌，即近于北方书风。李世民接触王羲之书风是从虞世南身上开始的。米芾称：“太宗力学

[1] 祁小春：《文本与记录文献中所见的〈兰亭序〉》，《美术学报》，2012年第5期。

[2] 寇克让：《书法没有秘密》，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263-264页。

[3] [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9页。

[4]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31页。

[5] 欧阳询等：《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上册卷四，第71页。

[6] 同注[3]，第2107页。

[7]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81页。

[8] 马宗霍：《书林藻鉴》，1984年，第110页。

[9] 桂弟子译注：《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10] 同注[7]，第134页。

[11] 同注[8]，第76页。

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12]虞世南去世之后，李世民任褚遂良为侍书，《书断》称褚遂良“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并且“得羲之法最多，真字有隶法”^[13]。除此之外李世民应当也学过王献之。唐初书坛皆学王献之与萧子云，李渊本人师从王褒，而萧子云是王褒的姑父，自然李世民对王献之一流的书法也是很熟悉的。如上所述，李世民的书法来源不止一端，他身边的书法家除了虞世南外，褚遂良等人不是纯粹的二王嫡派，所以李世民本身所受到的书法传承并不是简单如宋代以来所说的得王羲之法，而是糅合了南北风格及大小王的姿态。但是在各种史料中，他书学的其他来源被掩盖。到宋代，史陵的存在被忽略了，一个“不减欧虞”的人，《宣和书谱》中无载，更没有提到李世民曾学史陵书的事情。

对于社会风尚而言，隋唐时代，朴素刚直的北朝书风已经显得单调而缺乏韵致，包括皇室在内的大批贵族和文人都接受了王羲之父子的书坛领袖地位。但在唐太宗眼里，王献之一流的书风也被大力抹杀，正如他在《晋书王羲之传论》中说：“（献之）观其字势之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萧子云）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14]王献之的书风是“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笔迹流泽，婉转妍媚”^[15]。随着对书法理解的加深，王献之的地位在李世民心目中逐渐降低，其父王羲之中和、以骨力胜的书风开始提高。显然，于公于私，王羲之振奋挺拔的精神更能为他的统治服务，故而他决然开始推崇王羲之。从学其书到推崇《兰亭序》文本，到为《晋书》王羲之本传作论，这一系列举动都向世人摆明了他推崇王羲之的态度，而以往所学，如史陵、王献之等则逐渐不再提起。尊崇王羲之而贬抑献之，也许还有李世民的精神层面的原因，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得位，故而可能对父子君臣伦理纲常较为敏感，因此崇父抑子也就顺理成章。

李世民甚至修改史料记录来尊崇王羲之。《晋书》王羲之本传的赞论即由李世民亲自撰写，现本的《兰亭序》文本也堂而皇之被全文收入《晋书》。李世民以政府名义修五代史，新修《晋书》因为是太宗御撰，流传极广。而原先关于晋朝的史实之记录，如南齐臧荣绪曾著《晋书》一百一十卷，还有多家私修晋史，反而失传。

在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影响之下，贞观初年，王羲之及其作品已经逐渐走向高台，收集和整理王羲之书作一事则顺理成章了。

四、《兰亭序》的出现^[16]

（一）贞观年间的征集活动与成果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徐浩《古迹记》都提到，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曾面向国内购求古法书，以王羲之书作为主，还有张芝、张昶等

[12]同注[8]，第79页。

[13]同注[8]，第84页。

[14]同注[3]，第2107页。

[15]同注[8]，第51页。

[16]相关内容详见吴慧平、张伟文：《贞观年间对王羲之书法的征集》，《中国书法》，2015年第6期。

[17]张彦远：《法书要录》，载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

[18]同上注。

[19]同注[17]，第148-149页。

[20]张彦远：《法书要录》，载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14页。

其他人的书作。《古迹记》记录的整理人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魏征、侯君集、杨师道、李大亮、李孝恭、唐俭、韦挺，这个署名应当是签在装裱好的手卷后面的，而且排署的工作是起居郎褚遂良完成的；《二王等书录》则明确说是由褚遂良、王知敬在玄武门西长波门外科简。而且褚遂良留有《右军书目》一份，又侯君集、李孝恭等人均是名将，也未曾有善书的记载，则长孙无忌等人大抵只是挂名领衔而已，所以实际鉴定工作应当主要由褚遂良完成。

“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纸，一帙八纸，随本长短为度；行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其书每缝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贞观’。”^[17]

本次法书所得，若按卷数分，比前代已经减少许多，褚遂良的右军书目录有正书五卷四十帖，行书五十八卷，第三卷、三十六卷、四十六卷无具体细目。没有草书目录，此目只是记录了当时法书的一部分，许多今天能看到的名帖摹本也榜上有名，如《快雪时晴》等。从中可以看出，本次征集鉴定活动是有很大成果的。

但本次收集活动也存在很多缺点，如搜集范围不够广泛，没有对外收集王献之的法书，“大令书不之购也，天府之内仅有存焉”^[18]。

还有，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则本次搜集活动前后并未超过一年，以简短的时间来完成几百卷、几千纸的鉴定整理工作，肯定有许多仓促草草的地方。“既所不尚，散在人间，或有进献，多堆于翰林杂书中，玉石混居，薰莸同器。”^[19]许多书迹被随意对待，没有得到认真的整理和鉴别。

（二）《兰亭序》的出现与下落

关于唐初寻访《兰亭》的活动，最直接详细的记录有何延之《兰亭记》与刘餗《隋唐嘉话》，何延之谓贞观初年萧翼奉命往越州辩才处诈取《兰亭》，而刘餗谓于武德四年萧翊为秦王取回《兰亭》，翊、翼二字同音，盖同一人而异字。两种说法涉及的发生时间、人物都有差别，其中何说最为详细且曲折动人，让人怀疑是小说家言。

两种说法都有疑点，真实情形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贞观年间《兰亭》一反常规的现身方式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李世民喜欢王羲之书法，大肆搜求，各方献书，影响深远，但所献作品都往长安汇集，只有《兰亭》不为所动，需要皇上派遣萧翼前往越州用计赚回。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唐朝廷对何延之的说法是默认或肯定了的。因为何延之提到开元十年他将《兰亭记》进呈内府时，得到三十疋绢的赏赐，而这之后，这种说法在社会上流传越来越广，张怀瓘等人也都采纳这一说法，张彦远将《兰亭记》收入《法书要录》，也可见他对此记的态度是认可的。唐末以后甚至有以此事绘制成画的做法，传世有旧题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辽宁省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均有同题材画作，可见其流传之广。

《兰亭序》进入宫廷之后，李世民对其十分看重，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兰亭》《乐毅》，尤闻宝贵。尝令搨书人汤普彻等搨《兰亭》，赐梁公房玄龄等已下八人。”^[20]

除此外就只有《乐毅论》有摹搨记录，对于其他书迹，则都没有摹搨记录。搨本分赐重臣的行为可以看出《兰亭》在李世民心中的分量，宋以后各种文献也常有欧、虞、褚等大书家奉命临摹的记载，但事实上，当时真正见过及从原本上临摹《兰亭》的人却是寥寥可数的。

唐代文献很少提到当时名臣奉命摹搨《兰亭》，但是当时社会上确实兴起临摹《兰亭序》的风气，对于普通读书人而言，书法是走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对于皇帝的侍臣而言，学习《兰

亭》是投皇帝所好，对政治前途也有很大影响。所以即便不是奉命临摹《兰亭》，但私下临摹的做法应当是很流行的。事实上，在唐代《兰亭》的书法和文章都得到广泛的传播，除了上述的一些本子外，敦煌文献中也有多件写本，其中伯二五四四号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这份初唐写本的文字与现本《兰亭序》文字基本相符，自然是《兰亭序》在唐初被广泛传播的力证。

既然原本无法得到，则当时名臣所能临摹的本子应当只有内府赐予的及私下掘出的摹本。从此以后，文献中再不提《兰亭》的状况，连李世民与大臣之间的讨论也没有，从贞观十三年以后，包括《兰亭序》在内的法书就被深藏内府，外人基本上失去了一睹真迹的机会。《兰亭》真容就这样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般地消失了。消失的时间不是在李世民去世后的时间里。就是在贞观十三年后，离李世民去世还有很多年的时间。这一景象与当时社会上崇尚《兰亭序》的氛围格格不入。

除了李世民对《兰亭序》非常厚爱之外，继任者也对这份法书十分重视。永徽四年（650）曾由褚遂良书写，万文韶刻字，李世民与李治所作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及《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镶嵌在大雁塔下外墙里，咸亨三年（672）这两篇文章又由怀仁集王羲之字，再次刻石立碑。本次工程的最后落款者官衔十分清楚，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几乎可以肯定，本次工程是得到宫廷认可和支持的。在《集王圣教序》中有许多字是集自《兰亭序》，且这些字与现存的神龙本特征很吻合。正是《集王圣教序》的出现，使得《兰亭序》的影响更加广泛。

遍阅唐代史料，并没有哪份文献明指《兰亭》是我们所说的天下第一行书，在褚遂良的《右军书目》中，它只是排在行书类的第一卷，而且同卷装裱的还有另一份《缠利害》帖，《兰亭序》只是李世民在个人喜爱和文化政绩的立场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他的态度却影响了他的臣民。通过撮本，《兰亭序》化身千万，在读书人之间广泛流传。

（三）《兰亭》原本的消失与猜想

《兰亭序》在李世民去世后即随葬昭陵，这一点似乎无异议，但是具体的记载有差别。

何延之《兰亭记》：“（帝）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高宗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兰亭》）随仙驾入玄宫矣。”

刘餗《隋唐嘉话》的记录：“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韦述《叙书录》：“《兰亭》一时相传，云将入昭陵地宫。”

李世民去世前向儿子求陪葬物是很正常的事情，反倒是《隋唐嘉话》的记录，让人觉得褚遂良此举稍显多事，但似乎有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是属于李世民和褚遂良之间的事情。从褚遂良的语气来看，十分坚决，应该是与先帝事先就商量好后的做法。据欧阳修《晋兰亭修禊序跋》：“昭陵为温韬所发，其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于人间。”则随葬昭陵的书画，并非只《兰亭》一卷，臣子何须如此着忙，特意要求将《兰亭序》随葬呢？

真实原因或许是李世民和褚遂良都发现了《兰亭序》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是仿冒品，所以君臣二人才会如此心照不宣地要求《兰亭序》必须殉葬昭陵，最终导致《兰亭序》原本随葬，而同为李世民珍重的《乐毅论》却反而没有随葬，高宗时还曾拿出摹搨。李世民与褚遂良

之间的默契正说明他们对《兰亭序》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兰亭序》不能留在人间。当然理由也很冠冕堂皇——李世民的爱物，自然应当陪葬。就连早年命人摹榻《兰亭》，也都可能是李世民为了掩盖《兰亭》为贗品的事实而采取的行动。因为，王羲之书坛领袖的地位需要一份至高无上的法书来支撑，《兰亭》是文人精神性和艺术性良好结合的作品，故而世上不能无《兰亭》；但若《兰亭》为伪迹，则世上不能有《兰亭》原本。如此一来，《兰亭》只能依靠临摹本存世。只要世上没有《兰亭》原本，仅靠临摹本，人们自然无法对《兰亭》的真实性作多大的怀疑，从而也不能对李世民的“造星运动”这一文化工程产生负面影响。

五、假设与推论

通过上文一系列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 《兰亭》文本与早期记载有差别，如果《兰亭》是伪造的话，多出的文字可以使得该作品身价大增。
2. 神龙本《兰亭》笔法与传世王羲之其他书作摹本反映的面貌不接近，反而更接近于隋唐人的书作。
3. 《兰亭》早期的传承不甚清楚，似乎是凭空而降。
4. 《兰亭序》的被收入内府经历不甚清楚，各种传说矛盾重重，但这些说法却得到唐皇室的肯定和宣传。
5. 在唐初的鉴定工作中，包括《兰亭序》在内的二王法书并没有得到完全认真、负责任的整理和鉴定。
6. 今本《兰亭序》的原本真正见过的人很少，真正临摹过原本的唐代书家更少。
7. 随葬昭陵使得《兰亭》原本消失，再无人能见其真面目。

综合以上几点，现传本《兰亭序》很有可能是隋人根据王羲之《兰亭序》文字伪造的。当褚遂良和李世民一腔热情地将其收入内府时，也许他们都还没鉴别出来，等到发现时，《兰亭》早已名声大震，加上尊崇王羲之的实际需要，于是摹榻《兰亭》、大力吹捧《兰亭》和王羲之。直至李世民临终，君臣二人才默契地将《兰亭序》随葬昭陵，《兰亭》事件作为一个文化活动才最终落幕。据此，本文认为《兰亭》事件是唐太宗为了树立书法领域新偶像，而进行的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造星活动”。这一事件可从以下几个过程展开：一、贞观年间开展广收王羲之真迹的活动，真假不辨，照收不误。二、计赚《兰亭》，产生热门话题。三、将错就错，众人临摹，原本隐藏。四、亲自为王羲之做传，将《兰亭序》一文录入《晋史王羲之传》，弄假成真。五、太宗死后，《兰亭序》原本入葬昭陵，死无对证，留下临本在世，后人无法评说。

李世民以他本人的权威和喜好影响了世人，不仅使世人相信《兰亭序》真实存在，而且从文章到书法，《兰亭》都成为了我们学习的目标，他也把王羲之推到了当之无愧的书圣地位。总而言之，无论现传《兰亭序》是真是伪，它已经成为我国书法史上璀璨的明珠，和王羲之的其他优秀作品一道，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们。从这个角度说，李世民的造星运动不但成功了，而且他的运作方式对于今天的我们还起着深刻的借鉴作用。